



追寻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与鲁迅 (修订本)

秋 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追寻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与鲁迅

(修订本)

秋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秋石著.—3版
(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417-1

I. ①追… II. ①秋…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
人物研究②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①A755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0567 号

责任编辑 赵蔚华
封面装帧 傅惟本

追寻历史的真相(修订本)

——毛泽东与鲁迅

秋石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5 插页 8 字数 371,000

2015 年 12 月第 3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417-1/A·108

定价 68.00 元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中写作，办公桌右前角放着三卷《鲁迅全集》（资料照片）

1956年毛泽东为迁葬于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手迹。虹口公园也因此更名为现在的鲁迅公园。

鲁迅先生之墓

萬家墨雨
漫蕭蕭
夜有孔吟
地長心事
浩氣連天
于無聲處
歌之嗚
魯迅詩一首

為東東
月七
日本訪
的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

毛泽东手书鲁迅诗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赠送日本客人的手书鲁迅《无题》诗



1930年，由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拍摄的鲁迅像

言必信，行必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一诺千金，全面兑现了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时发出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的庄严承诺，三度出版《鲁迅全集》，在全民族中弘扬民族魂；耗费巨资，在鲁迅足迹所到之处的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建立了永久性纪念鲁迅的馆所。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绝后的。须知，上述六处纪念馆所，包括鲁迅故乡绍兴，全部为国有公共财产。其中，广州、厦门、南京三地的纪念馆，还为当地历史悠久的文物性建筑。而在鲁迅故乡绍兴，政府还出巨资购下了鲁迅故居、鲁迅父母家族祖居、及鲁迅上过学的私塾学堂等一系列庞大的有一二百年历史的古房产，与耗资数亿元多次翻修扩建的鲁迅纪念馆配套展出。



北京鲁迅博物馆



广州鲁迅纪念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



厦门鲁迅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



南京鲁迅纪念馆



1957年7月7日夜晩，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毛泽东主席与36位上海各界人士团桌座谈会之一：与毛泽东主席交谈者，正面左一为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毛泽东边上左起依次为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国际著名桥梁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同济大学副校长李国豪，国际著名医学专家、中国流行病学及预防医学奠基人、血吸虫病首席防治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苏德隆；与李国豪相对的“右下角”背影（花白头发表者），实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漆琪生教授。图中，毛泽东与应云卫之间探头倾听者为著名电影演员赵丹，赵丹里侧端坐者为45年后撰写《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的作者，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

（徐大刚摄）



1957年7月7日夜晩，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毛泽东主席与36位各界人士团桌座谈会之二：与毛泽东主席交谈甚欢戴眼镜者为民建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公私合营上海信谊制药厂厂长陈铭珊先生。

(徐大刚摄)



1957年7月7日夜晩，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毛泽东主席与36位各界人士团桌座谈会之三：与毛泽东主席交谈者，正面左起依次为：应云卫，著名电影演员赵丹、黄宗英夫妇，与黄宗英相对的长发女性背影为著名电影演员黄晨。赵丹身后远处戴眼镜抽烟者为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春桥，其左侧托腮凝神者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的著名作家、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工商业战线改革风云的首部鸿篇巨著《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复。

(徐大刚摄)



1957年7月7日深夜团桌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主席与36位兴犹未尽的各界人士轻松步出会议室，走在前往小剧场观看越剧《追鱼》的大厅通道中。毛泽东主席，柯庆施（前排左一），著名戏剧电影编剧王元美（前排右三），与一脸灿烂笑容凝望毛泽东的另两位演艺界著名女演员黄晨（前排右二）与黄宗英（前排右一）。

（徐大刚摄）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2013 年 12 月 26 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写在前面的话

在2011年4月本书初次面世时，出席1957年7月7日夜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举行的与毛泽东小圆桌对面座谈会的36位各界人士，尚有四位仍健在。及至2014年岁末，除经年累月在上海华东医院高干病房疗病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作者黄宗英女士外，三年中，又有两位前辈离开了人世。而且，这两位前辈都是中国戏剧电影界的元老级人物，历史上也都与黄宗英女士有着极深的渊源。这两位德艺双馨的前辈是：上世纪40年代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一手扶掖“甜姐儿”黄宗英走红影坛的伯乐、著名戏剧电影导演、新中国首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鲤庭先生，他于2013年8月在上海去世，终年102岁；以及历史上被黄宗英亲热地呼之为大姐的著名戏剧电影编剧王元美，她于2012年3月在上海去世，终年99岁。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数十年来，陈鲤庭、王元美两位戏剧电影界前辈，与黄宗英生活、工作在同一个上海。

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位可钦可敬的前辈，在黄宗英高调弹唱，之后持续数年被一些媒体及各色各样的好事者狂轰滥炸式渲染的过程中，并没有发表一个字的附和意见！据了解，当有人向陈鲤庭前辈通报（其实，一向耳聪目明的老人有天天读书看报的习惯，焉能不知半个多世纪前自己一手扶掖的这位爱徒掀起的这场狂风暴雨吗？）此事时，老人只是笑了笑，不予置评一个字儿。而同样迈入了九旬之年的王元美前辈却纹丝不为这位昔日小妹的惊天动地举止所动，依然是执拗地坚持每个月向离休前所在的党组织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直至四年后被批

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数年前，在笔者一次复一次赴东邻上海寻踪考证的过程中，有人（不止一个人！）向笔者转述上影厂一些老人对黄宗英此举的不解看法。在讲述了当年（即在1957年7月7日与毛泽东比肩而坐亲切谈话的次日上班前后）黄宗英赵丹夫妇是何等的兴高采烈逢人便讲他们夫妇二人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幸福情景与心情。对此，人们至今历历在目。因而，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黄宗英笔下的那些一波又一波的莫名惊恐自何而来？！

据了解，陈鲤庭先生对一些描述真实历史与人的纪实作品，有着极为严谨的视觉思维模式。据朱孝廷先生在其《晚年陈鲤庭的读书生涯》（见2014年2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10版）一文中这样写道：

夏瑜在陈先生还在世时，写了本《遥远的爱·陈鲤庭传》。夏瑜写这本书时，未直接采访过传主，书定稿后，亦未让陈先生过目，直到出版了，才送上门去。据友人说，对这本书，陈先生在书的天地头也用铅笔写了不少批语。我听说后也曾想问他要过来读一读，转而一想，陈先生晚年淡泊处世，不会如伟人般写出震世的眉批，终而作罢。不过我曾当面问过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他淡淡地对我说：“这书的写法，令人想起解放前那些爱追逐花边新闻的小报记者惯用笔法……”这话似乎让我咂出一点辣味，或许是我舌尖的味蕾有点过敏，是不好算数的。

所以，对于昔日爱徒黄宗英将自己归入“已不在人世”之列，没有向活着的自己求证一个字，写出的这篇“惊天地、泣鬼神”，并险些使自己腹中胎儿“蹦出来”的宏文，陈鲤庭先生当然要不予置评一个字了。他能说些什么呢？

然而，令人遗憾而又不解的是，2002年夏天，黄宗英女士在撰写令她又一次名声大振，而且是在短时间内远远超过她在电影文学领域的名声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时，竟然会“想不起”历史上对自己有恩及与自己过从甚密的陈鲤庭与王元美这两位长者是否还活在世上！正因为她“想不起”他们还活在世上（2002年，以及之后长达数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陈鲤庭与王元美身体是比较健康的，不但能够自己行走，读书看报，善于思维，而且还能够接待到访的客人并与之较长时间地面对面谈话及回忆往事），于是，远比他们要

年轻得多的黄宗英女士，便以此为借口，一举舍去了向近在咫尺的两位昔日过从甚密的长者求证！

行文至此，令我想起了为万千观众喜爱的那位“李双双”、1938年在国民党特务遍布的重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演艺界前辈张瑞芳。她于2012年6月28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令人们肃然起敬的是她一生高风亮节，尤其是在晚年。逝世前，作为有着74年党龄，经历过极其残酷的血雨腥风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名副其实的省部级高官（担任过第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不仅对党对祖国的忠贞信念始终不渝，而且，还时时、处处、事事为国家为人民精打细算，“抠门”到了极点。据一位采访过她的新华社老记者介绍，进入晚年，张瑞芳疾病不断，住院治疗成了一件常事。但张瑞芳严于律己，往往是病情稍一好转，就出院回到家中静养。临终前的最后一次住院，也是不等病愈回家后，致使病情突变，不及抢救便告别了人世。在今年1月巴金研究会的年会上，这位新华社老记者同我讲述这件事时，竟然动了感情，她说：“人总归是要死的，毕竟是90多岁的老人了，谁也不能保证她还能活多久日子，但至少病没有治愈便出院，是张瑞芳大姐很快就去世的原因之一。”

在2011年健在的人中，除陈鲤庭和王元美之外，还有一位昔日的沪上工商界精英人士、著名教育家丁忱先生。由于他晚年一直生活在海外，其起居健康状况不得而知。如若仍健在的话，他今年也应该是95岁高龄的老者了。

此番再版，基本上保持了2012年修订版的原样。由于经受了千余个时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再检验，以及广大读者与学术界人士的基本认可，故仅作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与此同时，鉴于1951年有关电影《武训传》上演引发的大讨论，以及随后开展的粗暴批判，特别是由于江青的介入与毛泽东作出的批示引发的风波。但在实际上，从北京到上海，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对电影《武训传》的演创人员作出任何形式的处分，故而，这场表面上看似来势汹汹的批判，应当视作为是对事不对人。本书出版后，有几位研究共和国历史的学者提出建议，建议将有关电影《武训传》引发的这场风波作一个必要而又简略的回顾与诠释，以利于教育后人，而不至于被《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不负责任的上挂下联式的描述而混淆历史。故，本文作者在走访一些老人及查阅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专门撰写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节